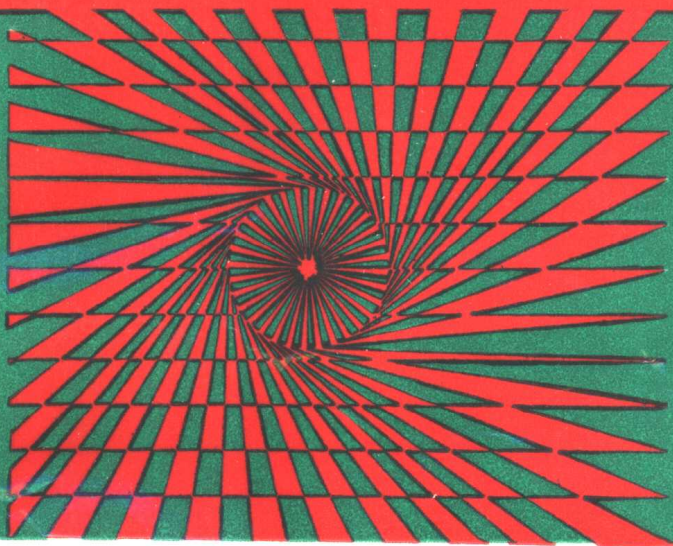


英汉 与汉英翻译教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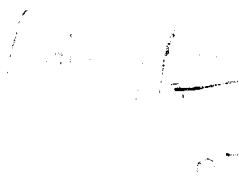
柯平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

柯 平 编著



北京 大学 出版 社

登记证号：(京) 159 号

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

柯 平 编著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875 印张 135 千字

1991 年 10 月第一版 199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册

ISBN 7-301-01454-6/H·153

定价：3.45 元

序 言

许渊冲

英国文艺批评家理查兹说过：翻译“很可能是整个宇宙进化过程中迄今为止最复杂的一种活动”。而英汉和汉英翻译，又可以说是这种复杂的活动中最复杂的活动。

在教学与科研过程中，我们发现不仅文学翻译是艺术，文学翻译理论也和创作理论、音乐原理一样，都是艺术。科学研究的是“真”，艺术研究的是“美”。科学研究的是“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的规律；艺术研究的却包括“有之不必然，无之不必不然”的理论。如果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表示的话，科学研究的是 $1+1=2$ ， $3-2=1$ ；艺术研究的却是 $1+1>2$ ， $3-2=2$ 。因为文学翻译不单是译词，还要译意；不但要译意，还要译味。只译词而没有译意，那只是“形似”： $1+1<2$ ；如果译了意，那可以说是“意似”： $1+1=2$ ；如果不但译出了言内之意，还译出了言外之味，那就是“神似”： $1+1>2$ 。

怎样才能译出言外之味，达到“神似”呢？我比较了一些译本，发现好的译文都发挥了译语的优势，至少也要改变劣势，争取均势，于是我提出了“三势”说，这是我翻译理论中的“认识论”。发挥优势可以用“深化”的方法，改变劣势可用“浅化”，争取均势可用“等化”，于是我又提出了“三化”说，这是我翻译理论中的“方法论”。“浅化”的目的

是使人“知之”，“等化”的目的是使人“好之”，“深化”使人“乐之”，于是我还提出了“三之”说，这是我翻译理论中的“目的”论。例如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第一章第一段最后一句有几种译文：

1. 据说，钟开始敲，我也开始哭，两者同时。

2. 据说那一会儿，当当的钟声，和呱呱的啼声，恰好同时并作。

3. 钟声当当地一响，不早不晚，我就呱呱坠地了。^①

第一种译文用的是“等化法”，可以使人“知之”；第二种译文中间用了“深化法”，可以使人“好之”，但是“同时并作”用的是“等化”法，所以不能使人“乐之”。第三种译文改成“不早不晚”，这就可以算是发挥了译语的优势。译语的优势发挥得越多，译文就越容易使人“乐之”。关于诗词翻译，我根据鲁迅提出的“三美”说“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把它应用到翻译上，就是译诗应该尽可能传达原诗的意美、音美、形美。简单说来，总结前人和自己的翻译经验，我得出了“三美”、“三化”、“三之”、“三势”的结论。

80年代后期，柯平来北京大学英语系担任翻译课的教学工作。他根据“符号学”对语义所作的分析，研究了翻译过程的第一部分，分析了受言内因素和言外因素支配的“理解”问题：前者包括对言内意义，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的理解；后者包括文化因素和非文化因素对指称意义、语用意义、

^① 许渊冲：《翻译的艺术》（论文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第203页。

言内意义的影响。北京大学以前的翻译课，基本上是把翻译理论当作艺术来讲的，柯平却给这门课增添了科学的因素。但在翻译过程的第二部分，即“传达”部分，柯平说翻译不但需要工匠的技巧和汗水，而且需要艺术家的灵感和良知，并且用了一半篇幅，来研究变通和补偿手段。这就说明他在设法调和科学和艺术的矛盾，认为“理解”主要需要科学技巧，而“传达”却可能需要更多的艺术。

其实，科学和艺术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朱光潜引用孔子的话：“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认为这是一切艺术的成熟境界，而“矩”就是“规矩”、“规律”，有科学的成分。《杨振宁访谈录》86页上说：“科学最后需要一些规律，这些规律如果是非常合适、非常妙、使人看了非常舒服，这与文学的美或一般人所讲的美是一样的。一篇文章的美与科学上发现了一个新的规律的美，其中有共同点，当然也有不同点。”从以上文学家和科学家所说的话看来，科学和艺术是异中有同，同中又有异的。应用到翻译上来，可以说原文和译语也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所以可以直译；同中有异，所以还要意译。其实，直译和意译也不是完全互相排斥的：有不同程度的直译，也有不同程度的意译。就拿上面狄更斯的三种译文来说，第一种直译度最高，第二种意译度较高，第三种意译度最高。但是，“两者同时”，“恰好同时并作”，“不早不晚”，到底是哪种直译度高呢？这就很难说了。我想借用杨振宁的话，如果译文“非常合适，非常妙，使人看了非常舒服”，那不管是直译或意译，都是好的译文。如果借用孔子的话，“非常合适”就能使人“知之”，就“不逾矩”；“非常妙”就能使人“好之”，就大致能“从心所欲”；“使人看了非

常舒服”就是“乐之”，就是“从心所欲”。而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杨振宁访谈录》83页上说：“中国的文化是向模糊、朦胧及总体的方向走，而西方的文化则是向准确而具体的方向走。”我想，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也是走向模糊、朦胧及总体的，而西方科学的翻译理论却是走向准确而具体。杨振宁又说：“中文的表达方式不够准确这一点，假如在写法律是一个缺点的话，写诗却是一个优点。”我却想到：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不够准确，但是简明好记，用在“理解”上如果是一个缺点的话，用在“传达”上是不是一个优点呢？就拿符号学的三种关系来说，只译了原语符号与译语符号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那可能只是“译词”；如果译出了符号及其所指称的实体之间的关系，那可能是我所说的“译意”；如果还译出了符号与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那就是我所说的译味了。

总之，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检验翻译理论的标准是出好的翻译作品。如果翻译理论能够产生好的译作，那就可以说明理论是正确的。

1990. 5. 4. 于畅春园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翻译在文化交流和社会发展中的 作用	1
第二节 翻译课在外语教学中的地位	6
第三节 翻译的概念	7
第四节 可译性问题	9
第五节 译者的素养	10
一 扎实的语言功底	11
二 广博的言外知识	15
三 敏锐的感受能力	17

第二章 翻译的语义学

第一节 意义的概念	19
第二节 三类符号学意义	20
一 指称意义	22
二 言内意义	23
三 语用意义	27
第三节 首先保证特定上下文中主要意义 的传译	31
第四节 风格的重新考虑	34
第五节 翻译质量标准：符号学的翻译原 则	37
一 前人提出的翻译原则	38
二 符号学的翻译原则	43

第三章 翻译的过程	46
第一节 理解	46
一 理解的精确	47
二 受言内因素支配的理解	50
三 受言外因素支配的理解	71
四 文化因素	75
第二节 传达	96
一 语序	97
二 被动句	98
三 主语的选择	99
四 长句	102
五 变通和补偿手段	108
六 比喻	139
七 专名	143
八 拟声词	153
九 倍数	157
十 韵律	159
第三节 校改	168
一 校对的必要	168
二 去除翻译腔：文字润饰	169
第四章 错译分析	174
第一节 主要由言内因素或不当的翻译原 则引致的错误	174
一 欠额翻译	175
二 “超额”翻译	178
第二节 言内因素和言外因素均可引致的	

错误	179
一 错解原意	179
二 使生误解	182
第三节 主要由言外因素引致的错误	184
一 穿凿附会，曲解原文	184
练习	187
后记	205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翻译在文化交流和 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语言的翻译几乎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两个操着不同语言的原始部落间的关系，从势不两立到友善相处，无疑要依靠彼此思想的交流，要依靠相互理解，要依靠翻译。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明的保存、社会的发展，首先应归功于翻译。从古罗马帝国到现代欧洲共同体，从基督教的传播到佛教的弘扬，任何离开翻译人员的工作都是难以想象的。

西方幸存的最早译作出现于公元前3世纪（前285—249年）。当时埃及国王托勒密二世邀请了72名学者来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把《圣经·旧约》从希伯来语译成希腊语，以满足亚历山大城说希腊语的犹太人的需要，书名叫《七十人译旧约》。

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西方出现过5次翻译高潮。第一次是公元前4世纪。当时希腊社会开始走向衰落，但希腊文化依然光辉灿烂，无可比拟。被誉为罗马文学三大鼻祖的安德尼库斯、涅维乌斯和思尼乌斯，以及后来的普劳图斯、泰伦斯，都用拉丁语翻译或改编了荷马史诗以及希腊三大悲剧家及米南德等人的大批希腊作品，把

古希腊文学，特别是古希腊的戏剧介绍到罗马，促进了罗马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而罗马文学成了后来欧洲继承古希腊文学遗产的一个重要媒介。

西方第二次翻译高潮出现在公元4—6世纪，即罗马帝国后期至中世纪初期。这个时期的翻译以宗教文献为主。4世纪时出现了《圣经》的多种拉丁语译本，最后以吉洛姆在382—405年间译的《通用本圣经》为定本。中世纪初，随着来自北方的日耳曼“蛮族”各自建立国家，《圣经》也被译成各“蛮族”语的译本，有的译本甚至成为该民族语的第一个文学材料。

11—13世纪（中世纪后期）是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三个高潮时期。这是希腊典籍“回娘家”的时期。早在9和10世纪，叙利亚学者汇聚雅典，把大批希腊典籍译成古叙利亚语，带回巴格达，使巴格达成为阿拉伯人研究古希腊文化的中心。到了11世纪，这些译成阿拉伯语的希腊作品大量出现在西班牙的托莱多。11—12世纪间，西方翻译家云集托莱多。托莱多成为欧洲学术中心，成立了类似于巴格达的“翻译院”，大批希腊作品又从阿拉伯语译回拉丁语。

14—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西方翻译史上的第四个高潮。大批希腊作品的重新发现（多半归功于上面提到的阿拉伯人的翻译），促成了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翻译活动在这个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翻译的作品涉及思想、政治、哲学、文学、宗教等各个领域，产生了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和作品。马丁·路德首先用本族语译出了第一部“民众的圣经”。1611年，英国《钦定本圣经》出版，它以其地道、通俗和优美的英语赢得了“最伟大的英语译著”之称，并深深

地影响了现代英语的发展。法国的阿米欧用 17 年时间译出普鲁塔克 (Ploutarchos, 约 46—约 120) 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为人类贡献了一部不朽的译著。西方翻译史上的四个高潮有力地说明了语言对于民族语言，民族文学和民族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也有力地说明了翻译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翻译范围迅速扩大。亚、非、拉的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以民族语言作为官方语言，翻译在各民族之间所起的沟通作用愈益重要，西方的翻译界正经历着第五次高潮。^①1958 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以后，西欧各国之间以及与外部世界在各方面的交往日益密切，对翻译工作的需要量也越来越大，欧洲现有 20 多所翻译学校负责培训翻译人才，其中最著名的几所分别在巴黎、日内瓦和苏黎世。翻译对世界各国的科技、文化、经济乃至旅游事业都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

中国的翻译，从公元 67 年天竺 (印度) 僧侣摄摩腾和竺法兰来到洛阳白马寺讲经与译经以来，已有近 2000 年的历史，出现过的翻译高潮大致也有五次。第一次是从东汉到唐宋的佛经翻译。这时期出现过中国佛教的三大翻译家：鸠摩罗什、真谛、玄奘。鸠摩罗什 (Kumārajīva, 344—413)，天竺人，东晋时来华，译经 300 多卷，一改过去音译的弱点，主张意译，并倡导译者署名。他的译著有“天然域之语趣”，表达了原作之神情，为我国的翻译文学奠定了基础。真谛 (Paramartha, 499—569)，印度佛教学者，南北朝时来华，译了 49

① 见谭载喜：《西方翻译史浅谈》，《翻译通讯》，1985 年第 7 期。

部经，其中尤以《摄大乘论》对中国佛教思想有较大的影响。唐代，玄奘于628年去印度取经，17年后回国，主持了在组织制度方面比过去更加健全的译场，19年译出75部佛经，共1335卷，且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是第一个向国外介绍汉文著作的中国人。他的翻译标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直到今天仍有意义。由于佛经的翻译，使“佛经”和“论”两种文体进入汉文。

明末清初的西方科技著作的汉译和中国典籍的西译构成了中国翻译史上第二次高潮。明万历年间到清代“新学”时期，出现了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合作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利玛窦也是最早将“四书”译成拉丁文的译者。1687年，比利时教士柏应理（Philippus Couplet）在巴黎首次刊印《中国哲学家孔子》。“五经”中最早受到注意的是《易》和《尚书》。康熙年间，法国人白晋（Joachim Bouvet）、刘应（Visdelou）、马若瑟（Joseph—Maria de Premare）和雷孝思（Régis）先后对《易》和《尚书》进行过翻译和研究。中国经典和儒家学说就这样通过意大利和法国传教士的翻译与介绍，先后有了拉丁文和法文译本，流传到欧洲知识界和上层社会。

五四以前对西方政治、哲学和文学作品的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三次高潮。严复译了《天演论》，其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要义，激励中国近代的仁人志士们进行了民主革命。他还参照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根据自己的实践，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林纾译的160多部文学作品，激起过很多中国现代人对于外国文学的兴趣。

中国翻译史上的第四次高潮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后的十几年。这个时期我国对马列著作的汉译和《毛泽东选集》民族经文及外文的翻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这些经典著作的翻译锻炼了一大批翻译人才，为我国翻译事业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大量翻译和出版了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的文学作品。

1978年实行开放政策后开始的西方学术著作和艺术品的大量译介，是中国翻译史迄今为止的第五个高潮。这个高潮仍在继续向前推进，帮助当代中国公民了解世界，走向世界。但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作品译成外文量少质低的局面。1986年，瑞典皇家文学院诺贝尔文学奖的18位评委之一马悦然(G. Malmqvist)教授曾应邀来华参加当代中国文学讨论会。他在会上指出，中国文学作品之所以尚未被诺贝尔奖承认，原因之一就是作品的翻译质量问题。马悦然教授在巴黎同一位华人教授谈话时强调：优秀的翻译文本是外国作家入选的“最重要的因素”。他说，巴金的《家》，中国虽出了英译本，“可是那个英译简直是谋杀文学，甚至令人倒胃口”。沈从文的《边城》，译文也很糟。“试问这种拙劣的译文怎样去说服人家同意这是好的文学呢？”1987年著名文学理论家王元化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瑞典，受到马悦然教授的接待。访谈中他们深深体会到马教授言之有理。马悦然教授说：评委会18位评委中只有他一人懂中文，其余人只能靠读西方语言的译本来了解原著；译本好坏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原著的评价。难怪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川端康成是带着自己作品的译者去领奖的，并在致辞中感谢译者将他的原作忠实地

译成了优美的英文^①。

为了更多更好地引进、介绍国外的科技和文化成就，加快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也为了走向世界、让世界人民更多更好地了解中国，中国今天和明天的翻译工作者们需要努力学习和工作。在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文化交流方面，他们将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第二节 翻译课在外语教学中的地位

翻译是外语专业学生日后工作的主要形式之一，所以在专业外语听、说、读、写、译这5种基本技能中，它是不可缺少的一种技能。在某种程度上，它还是听、说、读、写这四种技能的综合反映。技能是需要通过学习和训练才能获得的。丹麦语言学家奥托·叶斯珀森（Otto Jespersen）曾提到，居住在德国中部卢萨蒂亚（Lusatia）的文德人（Wends，斯拉夫人的一支）会同样流利地说本族语和德语，但却不会将两种语言对译，因为大家都能说双语，翻译不太需要，翻译技能也就没有得到训练和发展。

翻译训练可以帮助学习外语的学生更加明确地意识到两种语言的特点以及它们所折射的两种文化的差异，从而提高对所学语言的敏感程度，加深对外语以至于本族语的理解。例如，讲故事时先讲到了还没有发生的事，英语说：

But we are getting ahead of the story.

汉语则说：

^① 见王大象、林路：《国际文化交流的使者》，《文汇》，1988年2月号。

不过我们说到故事后头去了。

这里面就有两种语言所反映的两种文化对时间的观点不同。一个学英语的同学把“他抽烟已经五年了”译成：“^① It is five years since he smoked (他戒烟已经 5 年了)。就是因为他并没有真正掌握英语中 since 这个词的意思及通过 since 这个词和英语中过去时态的意义与用法。

翻译课是在学生已有较好的外语基础上开设的一门课程，它的主要任务是系统地介绍翻译的基本规律、基本理论和技巧，指导翻译实践、提高学生的实际翻译能力。它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一门技能课。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既要系统学习一些原理和技巧，更要多多动手实践，在实践过程中掌握这门技能。

第三节 翻译的概念

一般的翻译教科书都把翻译定义为“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②或“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方面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外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的过程”^③ 这样定义翻译时，往往都需要再对“准确”、“完整”和“意义不变”之类的说法加一番限制，说明它们都是相对的概念。

① * 在本书中表示不正确或欠妥当的译文。

② 张培基等编：《英汉翻译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3 年版。

③ 巴尔胡达罗夫：《语言与翻译》，蔡毅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5 年版。